

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时代下的战略选择——以韩国为例

邵男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33002;

摘要: 中等强国概念由 16 世纪意大利学者博特罗首次提出, 经发展后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范畴。韩国作为东亚中等强国代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经多届政府推进身份建构, 获国际社会认可。在大国竞争时代之下, 韩国在安全领域强化美韩同盟, 在经济领域借“新南方政策”与自贸协定建立韧性体系, 全球治理中凭 MIKTA 等机制提升自身话语权。但大国间的博弈挤压、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及半岛安全困境始终制约其外交空间。韩国的战略实践为理解中等强国理论在当代国际秩序中的价值提供了参考, 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大国竞争; 中等强国; 全球治理; 韩国

DOI: 10. 64216/3080-1494. 25. 11. 055

历史上, 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权力转移必伴随大国激烈竞争乃至对抗。而这种不可避免的大国博弈, 直接将韩国这类身处战略旋涡的中等强国推向关键位置, 使其频繁面临“在大国间如何权衡、怎样选择”的棘手难题。因此, 以韩国为例探究中等强国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选择逻辑及深层动因, 意义重大。理论上, 明确韩国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双向互动, 既能填补国际秩序研究中“中等强国视角”的空白, 又能为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理论体系注入新活力, 丰富研究维度。现实中, 厘清韩国在中美竞争中的双重角色与战略逻辑, 不仅是理解亚太地缘格局演变的关键切口, 更能为东盟、欧盟等地区的中等强国应对大国竞争, 提供可借鉴的现实路径。

1 大国竞争下的中等强国

1.1 大国竞争时代的主要特征

当前, 大国竞争已成为重塑世界政治格局的核心变量, 其深度与广度正推动国际秩序向新的形态演进。因此, 精准把握大国竞争的本质内核与时代新质, 不仅是解析世界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论必需, 更是回应现实国际挑战的实践前提。

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成为大国竞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节点, 其政策逻辑和战略偏好势必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世界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大国竞争的烈度加剧, 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后, 向俄罗斯示好, 尝试解决俄乌冲突问题, 并在西半球寻求建立

势力范围, 使得中美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二是地缘政治的竞争正在从传统的领土争夺转向更加多元和复杂的领域。大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 争夺关键地区的影响力与战略资源, 体现了通过军事、经济、外交、科技、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进行的竞争。三是竞争形态转向“混合持久化”, 大国把关税壁垒、科技脱钩、金融制裁、供应链重塑、信息战等手段常态化, 形成全天候、全社会、跨政府协同的缓慢消耗战, 目标不再速胜, 而在长期拖垮对手并锁定新秩序。

1.2 中等强国概念

中等强国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命题, 而不是单一的政治现象或经济现象。16 世纪意大利学者乔瓦尼·博特罗他在其著作《国家的理性》(1589 年) 中将世界分为三类: 大国 (grandissime)、中等强国 (mezano) 和小国 (piccioli)。他将“中等强国”定义为拥有足够实力和权威、能够独立自主、无需他国援助的行为体。此外, 中等强国“既不会因为弱小而遭受暴力, 也不会因为强大而招致嫉妒。这是国际社会中最早出现中等强国的概念。

现代中等强国概念起源于二战后, 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理论与实践推动形成。加拿大外长麦肯基·金最早提出“Middle Power”应作为国家阶层存在, 认为“加拿大虽非大国, 却是仅次于大国的中等强国”, 尤其在筹建联合国时, 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均有权发声”,

并从国家身份认知与历史发展角度界定该概念。冷战后期,墨西哥学者冈萨雷斯认为,中等强国指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世界力量格局中居于中间地位的国家,可调动其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简而言之,这些学者将中等强国界定为有能力且有意愿维护国际法治、促进全球稳定的国家。其独特的影响力使其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者,并因此享有特殊地位。

2 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认定

冷战时期,韩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经济腾飞并持续增长 30 年,国力增强为外交奠基。金泳三政府时期,韩国正式提出追求“中等强国”身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事务。金大中政府进一步强化该身份,外交自主性提升,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愈发凸显^[2]。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已获国际社会一定认可,外交重点转向东北亚。李明博政府致力于打造“全球韩国”,侧重全球外交,认为韩国已从贫困国家发展为中等强国。朴槿惠政府延续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文在寅政府虽未在官方文件明确称韩国为中等强国,但文在寅多次演讲提及该身份,表明政府认可并支持。尹锡悦政府则主张通过扩大多边外交领导力、提出全球问题解决方案、加强气候与碳中和外交、推动发达国家式国际发展合作及拓展公共外交品牌,强化“全球枢纽国家”角色,争取匹配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韩国国际秩序自觉意识的形成,映射其发展路径、国际地位与国家利益的内在关联,且与国际秩序演进同构。

韩国自卢泰愚政府提出“中等强国”概念后,经多届政府推进逐步巩固这一身份,而雄厚的综合实力是重要支撑。韩国曾创造“汉江奇迹”,跻身“亚洲四小龙”,现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经合组织(OECD)重要成员国。2012 年加入“20-50 俱乐部”,成为全球第七个人均国民收入超 2 万美元且总人口超 5000 万的发达国家;2017 年人均收入破 3 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关键经济标志;2023 年 GDP 达 1.71 万亿美元,展现强劲经济活力。科技领域,韩国存储器半导体技术居世界顶级,2020 年市场占有率 18.4%,自 2013 年起稳居全球第二,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维持优势^[3]。文化软实力与外交能力同样突出,1988 年汉城奥运会、2002 年日韩世界杯、

2010 年 G20 首尔峰会等重大国际活动的承办,大幅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国内层面,民主政治稳定转型与文人政权和平交替,夯实国家治理体系,为参与全球事务提供制度保障。2025 年 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中,韩国位列第 27 位,印证其综合实力。此外,韩国智库调查显示 76.8% 民众认同本国为中等强国,既体现国民信心,也为其中等强国身份注入社会共识。

3 韩国中等强国战略所面临的困境

3.1 大国博弈的挤压

韩国在东北亚的处境被形象地描述为“虾位于鲸鱼群中,当周围的鲸鱼打斗时,虾也有受伤的危险”。^[4]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两千多年以来,朝鲜(韩国)的命运都一直取决于一个国家控制朝鲜(韩国)的优势,或者取决于两个竞相控制朝鲜(韩国)的国家之间的权力均衡。”^[5]如何在多个竞争性大国之间维系平衡,始终是韩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升级及美国对华遏制力度的持续加码,作为传统盟友的美国希望利用盟友力量服务于其对华遏制议程,并要求盟友在关键议题上选边站队以对华施加压力。在这一布局中,韩国被美国视作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间美方频繁在公开场合对韩展开敦促,意图将韩国绑定在对华遏制的“战车”上。当中美在中国香港问题、华为限制、南海争议等议题上的对抗愈发激烈时,美国的对韩要求也随之升级。面对美国的敦促的“表态”,韩国态度较为消极。

从我国的立场上看,我们也不愿意看到韩国这种两面投机却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的发生。在将来,美国选择部署中程导弹的亚洲选址时,韩国是其潜在目的地。若届时韩国依旧不能妥善关切中国的安全需求,那么我国政府必然会有更加严厉的应对措施。

3.2 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

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其外向型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出显著脆弱性。2023 年,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率高达 96.5%,内需几乎停滞,形成“单引擎驱动”格局。^[6]一旦全球经济放缓或主要市场需求下降,韩国经济便迅速失速。2024 年出口增速跌至 1.4%,创 14 个月新低,凸显其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敏感。^[7]

产业结构单一进一步放大风险。半导体、化工、汽车三大产业占出口总额近六成，当芯片价格下行或汽车需求萎缩，整体经济即陷入低迷。此外，韩国能源、粮食对外依存度超 90%，地缘冲突或供应链中断将直接推高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8]

金融体系亦暴露脆弱性。韩国银行体系短期外债占比高，历史上多次因外资抽逃爆发流动性危机。虽加强监管，但仍易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冲击，韩元汇率剧烈波动加剧企业避险成本。^[9]

更严峻的是，韩国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对华贸易顺差占整体顺差比重逾 70%，一旦中国经济调整或中韩关系波动，韩国将直面逆差风险。^[10]加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25 年对韩钢铁、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压缩其出口空间。^[11]

内需持续疲软更令调控空间受限。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全球最低导致消费与投资长期低迷，难以在外部冲击时形成对冲。外向型经济曾成就“汉江奇迹”，但当前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结构性瓶颈。当务之急是通过产业链多元化布局、内需市场培育及区域合作深化，系统性降低经济脆弱性。

3.3 区域环境的复杂性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与核问题成为韩国对外政策面临的核心挑战。半岛上持续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立、经济割裂和军事对峙等冷战特征，在苏联解体后依然顽固存在，成为东亚地区冷战遗产的集中体现。这一局面深刻反映了东北亚地区的三重结构性矛盾：首先是半岛南北双方在民族统一主导权上的争夺；其次是以美日为代表的海权国家与中俄为代表的陆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最后是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12]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交织下，韩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寻求安全保障，而韩国则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由此导致的核危机持续升级，南北和解进程陷入僵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片不足 2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朝韩双方维持着总数近 180 万的庞大军队（朝鲜 110 万，韩国 68 万），军备竞赛强度堪称全球之最。

朝核问题的关键方——朝鲜和美国——都深陷权力政治的窠臼。美国坚持技术主义解决路径，专注于消

除朝鲜的核能力本身，却忽视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甚至在应对过程中暗含对朝“双重遏制”的战略意图。这种思维导致双方陷入“以强权对抗强权”的恶性循环，不断通过展示和增强实力来试图压制对方。在此背景下，韩国外交面临严重困境：一方面必须将大量资源投入国家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对美依赖。而要实现其中等强国的外交抱负，稳定的地区环境是基本前提。半岛持续的“亚和平”状态，从根本上制约了韩国外交战略的自主空间与发展潜力。

4 韩国中等强国战略的实践逻辑

4.1 安全领域的平衡与绑定

韩美同盟作为维系朝鲜半岛与印太地区稳定的核心支柱，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实现了从不对称、以区域为重点向更对称、具全球导向的重大转变，其历程见证了持久合作与战略演变。

2023 年 4 月，正值两国合作关系迈入 70 周年，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并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再次郑重重申双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承诺。这份强化的承诺不仅进一步夯实了两国深厚的邦交基础，更为韩美日三国合作的拓展铺平了道路。三方正积极推动在经济安全与科技领域的协同合作，开启了国际合作的全新篇章。同年，韩国将海外开发援助金额增加到 34 亿美元，此举既体现了韩国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决心，也彰显了其作为世界顶级经济体之一的地位。

2025 年 5 月 8 日，李在明外交团队核心成员金铉宗在访美期间明确提出，美韩同盟应当得到进一步升级。李在明本人在首场电视辩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立场，认为有必要持续推动美韩两国在安全、经济、产业链等多个领域实现同盟的提质升级。与此同时，他着重强调，在强化美韩同盟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并警惕对美国形成完全依赖。这一表态旨在清晰区分自己与金文洙等极端保守派在美韩同盟定位问题上的差异，凸显出其在处理同盟关系时寻求平衡与自主的思路。

数十年来，韩美同盟经历了无数挑战，其发展轨迹由地缘政治动态、国家利益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决定，这凸显了同盟的韧性和适应力。而同盟的管理风险能力，是其长期存在和有效运作的核

心,这种平衡反映了两国细致入微的理解和战略远见。

4.2 经济领域的实施成效

文在寅政府2017年推出“新南方政策2.0”,明确把东盟升格为“第二经济腹地”。借助RCEP零关税与原产地累积规则,韩国对东盟92%税目即刻降税,企业采购半径扩大30%,对华单一依赖显著下降。^[13]2024年韩—东盟贸易额达1780亿美元,四年增长23%,其中半导体及零部件占韩出口28%,汽车、石化合计再占35%,形成“韩关键中间品—东盟组装—反向消费”的区域闭环。^[14]投资同步深化:截至2024年底,韩国对东盟累计直接投资860亿美元,电子制造业独占42%,2023年一年即有120家韩资工厂投产。^[15]基础设施方面,现代建设、三星物产近五年在东盟交通与能源项目投入超150亿美元,既为原产地多元化提供硬件,也锁定长期订单。^[16]

对华关系上,韩国采取“经济深度融合、战略有限自主”的双轨策略。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CKFTA)实施十轮降税后,双边零关税比例已升至55%,并启动第二阶段谈判,拟把文化、旅游、法律等服务业纳入开放清单。^[17]2023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18.7亿美元,重心为半导体内存与车载电池;中国累计对韩实际投资1013亿美元,集中在化工、电气、电子零部件和研发服务,形成“韩高端中间品—中国终端制造”的深度融合。^[18]地方合作成为缓冲政治摩擦的安全阀:中韩(盐城)产业园、中国(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累计引进项目金额超过35亿美元,为两国企业提供关税、物流、金融等一揽子便利。^[19]

综上,韩国以东盟拓增量、以中国稳基本,借助自贸规则、产业投资与地方合作构建“有限经济自主”架构,既抵御大国竞争冲击,也强化了中等强国地位。

4.3 全球治理的多边机制

韩国积极借助多边机制拓展中等强国外交空间。通过MIKTA,韩国分步骤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合作与区域安全议题进展;2023年主办“印太海岸警卫队论坛”,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这些实践展现了韩国以安全议题为抓手,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外交路径。

2013年,韩国牵头联合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尼

西亚与墨西哥组建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韩国将MIKTA视为践行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杠杆,通过三步递进策略推动全球议程:首先,聚焦全球公共卫生。2020年9月,韩国主导MIKTA线上外长会,将“疫苗多边技术转让”纳入联合声明,并推动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促进全球抗疫合作。^[20]其次,拓展发展合作。2021年10月,韩国在首尔论坛提出《数字包容倡议》,经MIKTA内部协调后,成功将“缩小数字鸿沟”纳入G20峰会成果。最后,推动区域安全议题国际化。2022年5月,韩国利用MIKTA机制,将朝鲜半岛问题引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扩大国际关注度。

2023年韩国主办首届“印太海岸警卫队论坛”(韩国+东盟10国+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共同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为主题,聚焦打击IUU捕鱼、毒品走私与加强海域态势感知。^[21]会议发表《釜山宣言》,决定建立年度轮值机制与实时信息共享网络,并将韩国倡议的“印太海上安全卓越中心”写入成果文件,标志着首尔把海岸警卫队合作打造成“中等强国”安全外交的新支点。

5 结论

为维护自身利益,多数中等强国倾向于在大国间“摇摆”以规避选边压力然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压缩了与两国存在深度互动的中等强国的平衡空间。尽管战略选择的困境凸显,但中等强国仍拥有坚持自身战略取向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力。

韩国在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协调大国关系、创设国际组织等领域的参与愈发积极,不仅彰显其“中等强国”的角色定位日益清晰,更凸显出其践行这一身份的意愿不断强化。一是战略自主性追求,其多届政府持续建构中等强国身份,主动依据自身利益与国际格局调整外交,为其他中等强国摆脱大国裹挟、争取自主角色提供方向;二是安全与经济平衡,安全上“绑定同盟+保留自主”、经济上“拓新市场+稳核心合作”的策略,为同类国家应对安全威胁、优化经济结构提供借鉴;三是借力多边机制,通过牵头组建MIKTA、主办国际论坛等提升影响力,印证了中等强国联合发声、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路径。

韩国的中等强国战略为其他中等强国提供了“在大

国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实用模板，核心在于灵活平衡、自主发展、多边合作、软实力提升。这些经验对如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墨] G. 冈萨雷斯:《何谓“中等强国”?》,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 年第 6 期,第 43-44 页
- [2] Jeffrey Rbertsono, “South Koreaasa Mddle Pweri o: Capacity, Behavior, and Now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Kreano Unification Studies, Vol. 16, No. 1, 2007, p. 158.
- [3] IMD: https://imd.widen.net/s/2mpx5fkmk2/kr1page_wcy_2025
- [4] David Shim, “AShrimp amongst Whales? Assessing South Korea,s Rgional-Power Se tatus,” German Instituteof Globaland Area Studies, 2009,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resrep07655.pdf?acceptTC=true&coverpage=false&addFotero=false>.
- [5]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5 页。
- [6] 在韩华人圈. 韩国经济“出口依赖症”加剧: 2023 年出口贡献率达 96.5%[EB/OL]. 微信公众号,2025-05-25[2025-09-0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NTM1Mw==&mid=2247526529&idx=2&sn=1c605f95c74a39ba7372607c4cf6f1a8.
- [7] 和讯网. 韩国经济现状[EB/OL]. 2024-12-17[2025-09-07]. <https://m.hexun.com/japan/2024-12-17/215395543.html>.
- [8] 解放日报. 李在明说“绝望”,韩国经济怎么了?[N]. 2025-06-29(008).
- [9] The World Bank. Korea: Policy Issues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79.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中韩经济关系: 不对称依赖及其前景[R]. 2013.
- [11] The World Bank. Korea: Problems and Issues in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77.
- [12] 李栢. 尹锡悦执政下的美韩同盟与东北亚阵营化趋势[J]. 东北亚学刊, 2022 (05): 121
- [13] 吕春燕. 试论韩国文在寅政府的东南亚外交[J]. 国际研究参考, 2020(04): 98-114.
- [14] 王传剑, 李在勋. 韩国新南方政策与韩—东盟经贸合作[J]. 东北亚论坛, 2021, 29(05): 67-82.
- [15]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2024 年对东盟投资统计年报[R]. 首尔: 产业部, 2025.
- [16]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韩国建筑企业在东盟基础设施项目报告[R]. 2024-06.
- [17] 王嘉南. 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 2016.
- [18] 何敏, 张森. 新发展格局下中韩自贸区数字贸易策略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22(02): 45-58.
- [19] 江苏省商务厅. 中韩(盐城)产业园合作交流会议项目汇编[R]. 2023-09.
- [20]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Global Cooperation on Vaccine Multilat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Resolution A/RES/75/274, December 11, 2020.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0/284/79/pdf/n2028479.pdf>
- [21] Korea Coast Guard. “Press Release: Korea Hosts 1st Indo-Pacific Coast Guard Forum.” June 7, 2023. <https://www.kcg.go.kr/eng/board/view.do?seq=20230607001>

作者简介: 邵男(1998.10-), 性别: 女, 民族: 汉, 籍贯: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学历: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硕士研究生, 职称, 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